



四十年来家国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手表背后的酸楚往事

肖高晶

1978年7月20日,下乡一年的我,自信满满地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次高考。然而,因为一块手表的缘故,我与幸运之神擦肩而过。

高考前几天,我特地赶几十里山路从插队知青点回了趟家,不为别的,就因为家里新买了块手表,我想高考时戴着它掌握时间。到家后当我向母亲说明想法和理由,没想到遭到母亲严词拒绝。

母亲一辈子是个只上了两年学的家庭主妇。父亲在煤矿工作,每月辛辛苦苦挣几十元工资,不够六口之家养家糊口的。那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被称之为家庭“三大件”,我们家一件都没有。直到我高中毕业下乡基本自食其力后,家里好不容易才置办了这块手表,因此父母看得格外贵重。

那个年代,父母对儿子的前途没抱过高期望,总认为像煤炭一样黑的那顶矿帽戴在儿子头上是迟早的事。因此哪怕我有一个理由,穷怕了的母亲就是不为所动,放心我戴着家里唯一的宝贝去乡下,一是怕丢了这件贵重物品,二是怕有人拦路抢劫,招来横祸。第二天,没达到目的的我,两手空空心灰意冷地离开家,独自到离考点不远的公社林场寄宿备考。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考试的第二天,我早早起床,隔着林场食堂的窗口往里望了望钟,6时30分,还早,便到树林里看了会儿书,大约半小时后折回食堂,又望了望闹钟,还是6时30分,我顿时彻底傻眼了,天哪,这该死的钟怎么就停了。我空着肚子朝山下考场一路狂奔。流着汗、喘着粗气、满脸通红站在考场门前,我被严正告知迟到20分钟,不准进入。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直转。大约15分钟

后,巡查的人来了,为头的问明情况后,在已经开考40分钟时特许我进考场考试,但要求时间一到,停止答卷。

最终,我以离分数线4分的差距名落孙山,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我时常为自己错过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好机会而懊悔不已。

40年过去了,那年高考一直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片阴云,可当着家人的面我从没怨过谁。其实,说从无怨言也是假话,但要怨也不能怨母亲,因为她压根儿就不知道,当夜夜深人静、小山村安然进入梦乡的时候,有个插队知青还在昏暗的灯光下不知疲倦地备考;她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一个错误的决定竟然会毁掉儿子的“大学梦”。如果要怨,只能怨那个贫穷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贫穷,真的把人给穷怕了!

如今事情过去多年,尽管这块手表早已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尽管前前后后搬过好几次家,许多物品都没留下来,唯有它我却一直珍藏着。因为它不单是一件普通的计时器,也是我工作、生活的亲密伙伴,更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40年前,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曾是许多家庭的追求,如今对普通百姓来说,拥有汽车、商品房也已梦想成真。我家不仅有电脑、空调,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还在省城置了房,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甜了。

电视机的见证

黄超鹏

吃过晚饭,本应当是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起享受欢乐轻松家庭时光的时间。可我却发现,在我们家55英寸的高清网络电视机前,大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节目:妻子捧着平板电脑追她喜欢的韩剧,儿子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机,女儿霸占着电视机欣赏着动画片,我则打算回书房去打开笔记本,打开下载好的纪录片来欣赏。

我突然觉得,一家人坐在一起,看同一个频道、讨论同一个节目的场景变得可贵与难得。

记得30多年前,我六岁那一年,在镇上单位上班的大伯捧回来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让我们通过这个神奇的盒子接触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那是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伯父把电视放在我们两家共享的院子中央,开机的第一晚,大伯在屋顶上立起一条长长的电视接收杆,村里几乎一半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了我们院落里,有人搬来自家的板凳抢占前排,有人跨在墙上居高临下,人人都带着羡慕和好奇的目光,人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不断闪光的屏幕。那情景跟乡里放电影大戏一般热闹,尽管电视机里的信号来来回回也只能收到中央台的几个频道,大家仍看得不亦乐乎。

后来,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邻居家买回了电视。到我们院子里看电视的人渐渐少了。读小学时,父亲花费家里的大半积蓄也搬回了一台电视,记不清哪个牌子,只记得那台电视的右边

有三个旋转按钮,没有遥控器,每次都得手动调台和调节声音大小。后来听长辈们说,那时候家里有台电视已经非常了不得,至于彩电,想都不要去想。大多数看得上彩电的家庭,都是在香港或海外有亲戚捎带回来的。初中时家里的电视换成了彩电,是日本产的,用了十多年没有维修过,父亲常感慨说什么时候咱们中国人也能造出技术过硬、质量一流的家电来。

不止电视的颜色起了变化,电视节目也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多;卫星电视上天,有线电视入户,各地方台如雨后天春笋般崛起,家里富裕的人家还添置了录像机或影碟机,与彩电配套使用。有趣的是,父亲说完那句话没过多久,我们家又购置了一台国产的彩电,专门放在二楼供爷奶奶奶观看京剧。

再往后,家里陆续换了几台电视,有液晶的、超薄的、led的、数字智能的等等;屏幕的尺寸从小到大有尽有;从手动调台到遥控,再到手机控制和声控;电视伴侣从卡拉OK机和音箱,到电视盒或游戏机,再变到在线平台集成和无线路由器;节目形式也从单一单调,发展到多姿多彩,再到海量信息网上冲浪。

一个小小的电视见证了人民生活的欣欣向荣,见证了几代人的奋斗史,也见证了国家科技文化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慢慢变化,接纳更多的事物,展播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便捷,学习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智能化。

一枚小印章: 绵延80多年的感人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敏

一枚珍藏80多年的老红军印章

重走父辈路,深情洒老区。7月21日,参加纪念平江起义90周年活动的开国将领的后人们,走进了平江县革命老区加义镇咏生村。镇卫生院副院长胡璋琳找到前来慰问烈士后人的原国家经贸委技术与装备司司长江旅安,归还了一枚珍藏80多年的老红军印章。他释重负地说:“我终于完成了奶奶、爸爸的嘱托!”

这枚印章的主人,是江旅安的父亲江渭清。江渭清是平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曾任红十八军五十四师团政委;1935年,江渭清任中共咏生中心县委书记兼边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代理第一政委、福州军区政委、中顾委委员。“我们老区人民都叫他江政委。”至今,胡璋琳仍唤江渭清为“江政委”。

土地革命时期,江渭清带领军民跟匪军殊死搏斗,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平江人民甘于奉献,演绎了许多感人的军民鱼水情故事。

江渭清在咏生工作时,有一枚长方体的私印。一次,部队与敌人遭遇上了,江渭清带领军民突围,突然,纷飞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前有匪军,后有追兵,危急中,江渭清将印章交给战友陈勤凤代为保管。

陈勤凤是一位妇女干部。硝烟与烈焰,让山一样坚强的女人扛起了枪。在苏区,红军医院的药剂员、看护员,红军被服厂的缝纫工,基本是妇女;红军军械厂、学校、银行也有不少女干部;各地纷纷建立了妇女支前队,苏区姐妹成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犹如朵朵盛开的映山红。

战事频繁,形势险恶,苏维埃政府被迫转移。匪军在咏生大肆杀掠。一次,匪军又来围剿,陈勤凤恰好出门在深山野林中寻找食物,躲过了这场灾难。“印章、党的文件不能放在家里!”匪军地毯式的清剿,让陈勤凤非常担忧印章和文件的安全。在茫茫夜色掩护下,她潜回了加义镇丽江村的娘家。“这是一包很重要的东西,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管好!”弟弟陈集生在姐姐股股嘱托中接过印章、文件,他胸膛一挺,向姐姐保证道:“无论怎么样,我也会保护好的!”他用布将印章、文件严严实实包裹好,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后厢房的墙壁里。

一天上午,匪军突然闯入陈集生家来找陈勤凤。陈勤凤机敏地奔进屋后山躲过一难。匪军四处搜寻没有得手,气急败坏地将陈集生的家烧了个精光,还将陈集生抓去关押起来。地方善良士绅交了赎金才将他保了出来。

望着被烧得火光冲天的娘家,陈勤凤心如刀割。在烧得一片漆黑的墙壁中,文件已被烤焦,但印章仍完好无损。陈勤凤流下了悲喜交集的眼泪。

负伤脱险后的江渭清,在当地苏区干部周才世的援助下,被送往周方山里的泉水洞养伤。辗转10余日才到达泉水洞的江渭清,腿部伤口早已化脓、溃烂,高烧不退,负责护理的苏区女

王浣海

尽管当下的文艺评论总体上是向好向上发展,但横向上与热热闹闹的文学创作、艺术创作比较,文艺评论仍显得孤寂而冷清,关注度不够;纵向上与大师选出的近现代相比,当下的文艺评论发声太过微弱,积极作用的发挥不够充分,只有塔身没有塔尖。把脉当前的文艺评论,主要呈现三种病象。

一是批评立场不稳。当前文艺评论最被人诟病的,是越来越失去客观公允的立场,经不起现实的检验,向被评论者献媚,文艺评论演变成文艺表扬、文艺广告。最为突出的是“圈子评论”“人情评论”“红包评论”等。因为碍于情面、利益诱惑,评论者无原则地拔高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或对作品的瑕疵视而不见,失去了一个批评者最宝贵的追求艺术真谛的品质。或者为吸引读者眼球故作惊人语,或者因人情恩怨意气用事,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作品,甚至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举之上天”当然不好,“按之入地”也非正确的批评态度。批评立场的丧失,对文艺评论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导致了文艺评



江旅安(右一)在平江咏生县苏区旧址合影留念。

交员喻欢连用盐水代替酒精、棉花代替药棉、匕首代替手术刀,取出了子弹。伤口的毒脓淤积无法排出,喻欢连用嘴一遍又一遍地吮出毒脓。伤愈后,江渭清又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和陈勤凤彻底失去了联系。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映山红年年殷殷地开着,江渭清却一直杳无音讯。直到1979年2月24日,与外界缺乏通讯的陈勤凤也没能等到印章的主人。临终前,她将用麻布蚊帐细心包裹的印章交给儿子胡育生:“儿啊,你一定要将印章交给江政委。”由于咏生处于大山深处,不通电,不通车,不通邮,胡育生很难走出大山寻找江渭清。

1983年冬,一个北风凛冽的午后,一名商人模样的男子找到胡育生。男子环顾着屋顶盖着杉皮,墙壁满是裂缝的土坯房,问胡育生:“这是您的家吗?”当得知胡育生连房子都没有,还是借住别人的房子时,商人马上拿出一沓钱来:“这是5000块钱,够你盖2栋房子,但我有一个条件……”获悉商人买印章的来意后,这位195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一口回绝了:“我家没有印章,你找错人了。”

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胡璋琳对父亲的行为很不解。胡育生对儿子说:“这是你奶奶冒着生命危险才保存的印章,我宁愿挨饿受冻,也不能卖掉它。”

“1992年7月16日,父亲过世了,这枚印章传到我手头。”胡璋琳告诉记者,“1999年,我在屋顶架上了天线,家里的黑白电视才有信号。我从电视里知道,江政委就是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我兴奋得一跃而起,跑到后山烧纸钱告诉奶奶和爸爸。七拼八凑筹路费,准备去江苏归还印章。可惜没来得及凑足路费,2000年6月16日,我从电视里惊闻噩耗:江渭清老人在南京逝世了。”

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呼唤。听说省市县委隆重纪念平江起义90周年,胡璋琳预感江渭清的儿子江旅安会回老家,他跑到县老干局找到副局长喻东法,要到了江旅安电话号码:“可把您找到了!我要还您一样东西!”

胡璋琳向江旅安讲述了印章的故事,并询问道:“我镇准备在咏生县苏区旧址建展馆,您能否提供江政委的文献资料?”江旅安马上找

出父亲的照片和书籍,捐回来捐给展馆。

温润的黄玉印章浸染着岁月的苦难与辉煌

7月21日,纪念平江起义90周年“重走父辈路,精准扶贫”活动在平江举行。

炎炎烈日下,胡璋琳等待着江旅安的到来,就像等了一个世纪。“我找江旅安,我找江旅安!”他终于看到了一位戴着眼镜、精神矍铄的长者向他走来。

“您好!这是您父亲的印章,我们三代人都想物归原主。今天愿望终于实现了。”胡璋琳郑重地将一枚黄色的长方体印章交到江旅安手上。

这是江旅安第一次看到父亲土地革命时期所用的印章,温润的黄玉印章浸染着这段苦难与辉煌的岁月。捧着这枚与父亲分离80多年的印章,江旅安感觉手沉甸甸的。印章像父亲无言的目光注视着他,年逾古稀的江旅安泪眼婆娑。他把这枚印章给随行的老伴丁丹妮、女婿张为民、外孙张贵清和江冠洲——传阅。

胡璋琳指着咏生县苏区旧址西边一间保存完好的屋子对江旅安说:“80多年前,您父亲就坐在这里办公,窗户、椅子还是老样子。”江旅安的外孙江冠洲机灵地跳上去,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勾着小脚在江渭清坐过的椅子上摇来摇去。此刻,江旅安百感交集。

“感谢父老乡亲保护了我的父亲,保存了这枚印章。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我现在将印章捐赠给咏生县苏区旧址展馆,以示后人。”江旅安将印章蘸上印泥,分别在两个外孙的胳膊上盖上了章:“红色基因,流泽千秋!”

胡璋琳意犹未尽,又从书柜里拿出一本《江渭清在咏生》递给江旅安:“这本书是我根据奶奶的回忆编写的。”

“真是有心人,太珍贵了!”抚摸着这本书籍,江旅安连连称赞。“这本送给您。”胡璋琳把印章拿过来,“您在这本书上盖章,留作纪念吧。”江旅安将父亲的印章端正地盖在扉页,就像父亲端坐在他身边。

一枚小小的印章,牵出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它们就像一串珍珠,串起了革命历史的峥嵘岁月,传承了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

把脉当下文艺评论

论公信力的丧失。

二是话语表达不接地气。现在很多评论作品令人望而生畏、望而生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批评话语艰涩,不接地气。很多评论工作者都有一个浅薄的认识误区,认为写得太通俗显示不出自己水平,于是故作高深、结屈聱牙,大量堆砌专业术语,写些谁也听不懂的语句,长此以往,搁置鲜活生活语言的能力越来越差,更遑论深入感受精彩的现实生活,最终导致自己的写作成了独角戏表演,自说自话,孤芳自赏,与大众渐行渐远。

三是思维方式不缜密。一些评论作品言必称西方,动辄从西方文艺理论中寻求帮助,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作品,仿佛不这样不能显示自己的博学多识和理论功底,这在学院派批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结果很多评论作品变成了西方文艺理论的证明题,缺乏文化自信,没有自己的创见。其实,我国古代有大量文艺理论经典,如《典论》《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这些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富矿,我们完全可以在评论实践中丰富完善民族的文艺理论体系。

当下也有很多“口水评论”充斥文艺圈,这些

泛泛而谈不及物的评论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摒弃艰辛的研究精神,无视复杂的社会现实,不愿深入思考、精心构思,不愿“啃硬骨头”“挖深井”,使得许多文艺评论思想性缺失,由深阅读变成浅阅读,评论效果大打折扣。

真正的文艺评论应该是生命的自由表达,应该是个体经验向普遍经验的跃升,应该真正能发挥思想启迪、艺术熏陶的作用。我们要营造良好的、有益于文艺发展的文艺生态环境。孔子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鼓励作者与评论者交心,去除铜臭味、世俗情,做真朋友,让评论者沉下心来、敢于说真话,像鲁迅之于李长之,阳翰笙之于茅盾,艾略特之于庞德一样,磨砺评论者批评的锐气、勇气和作者听批评的雅量。要改进现有的文艺评论评价体系,更科学、客观、规范,让真正好的文艺评论受到重视,树立文艺评论标杆,匡正文艺评论风气。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评论才能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系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与评论》执行主编)